◆国际视野

编者按：美国和欧盟、日本一直是“盟友”。在保护主义的阴云下，“盟友”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贸易纠纷中。近来，美国和欧、日的贸易纷争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美日经贸如何找到平衡点？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尽管日本政府希望尽快取得谈判成果，但目前双方还未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谈判被推延至本月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有分析称，日美意见难统一，日美贸易协定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据了解，在今年的谈判中，农产品、汽车和汇率等都是日美谈判中较为棘手的领域，美国还希望缔结包括服务在内的更多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日就已存在贸易摩擦，起初双方的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纺织品领域。到70年代前，日美贸易摩擦虽已逐渐扩展到钢铁等领域，但在双方贸易中多以日方逆差为主，即使出现顺差也影响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双边贸易摩擦并未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实质性因素。然而，到了70年代，日本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密集型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日美贸易摩擦也随之扩大到半导体、汽车、电视等领域，彼此矛盾开始凸显。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并开始影响到日美关系发展。当时日本已具备了经济大国的实力。随着日本经济不断快速增长，美国逐渐发现，当年需要靠自己扶持的日本，已成长为自己的对手——日本在诸多领域与美国产生直接竞争。没有国家能够忽视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充满危机感的美国便将其视为经济贸易的主要对手。

据了解，日本汽车产业快速崛起导致日美汽车产业竞争加剧，当时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近乎为零，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则超过20%，日本成为美国汽车的最大进口来源国。虽然美日不同的汽车消费文化是造成这种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美国依然决定动用制裁手段来解决问题。

1981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通商产业省被迫同意主动限制对美国的轿车出口，将年出口量限制在168万辆以内，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对这一数字进行动态调整。在此基础上，美国还进一步要求日本加大国内市场开放，购买更多美国汽车。

除了汽车行业，美日之间最大的商贸问题依然集中在农产品领域。日本对自身农业一向采取高额补贴，严格保护国内农业生产者利益。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数十年来对打开日本国内农产品市场步步紧逼。“今年以来，由于美国退出了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依然征收高额的美国农产品关税，反而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参与了CPTPP的农业大国获利，农产品关税大降，日本掀起一股国外牛肉消费热潮。”吕耀东说。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加拿大出口日本的牛肉增长3.6倍，新西兰牛肉增长63%，美国牛肉仅增长17%。美国农民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近日来，美国肉牛养殖户相关团体已开始在美国两院活动，意在对日本施压。

“产业竞争加剧是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日美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反映在产业层面，产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比经济本身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成为日美不同阶段出现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吕耀东表示，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成长，很快缩小了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

随着日本国力的日渐增强，产业层面的竞争时有发生，特别是日本对美出口量的增多使得日美逆差不断加大。日美巨额的贸易逆差、相似贸易往来增多、日美彼此的贸易依赖性有限等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重要背景。

业内人士表示，日本虽然是经济发达国家，但对美国的依赖过大，美日贸易摩擦是美日同盟最大的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尽管美日目前谈判还未出结果，双方也是互不妥协，但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另外，不管是怎样的平衡，对于日方来说，都会是现状下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美欧贸易战是否升级引猜测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在日本大阪G20峰会后，美国停止对中国加征新关税。然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紧接着发布拟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补充清单”，涉及约40亿美元的欧盟输美产品。美方称，这是对欧盟飞机补贴造成的伤害的回应。

纵观2018年，美国除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外，对印度、墨西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贸易战。有人认为，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后，美国开始集中火力对付欧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贸易战大棒早就抡向了欧盟。由于欧盟本身就在特朗普政府全球经济狙击的名单上，且排名较为靠前，因此，美国暂停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继续对欧盟发动贸易战没有任何关系。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发动贸易战有两大目的：一是减少逆差、扩大顺差；二是增加美国国内就业。特朗普政府已经对多国发动了贸易战，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成为美国在贸易上攻击的对象。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健代理过多起涉外贸易纠纷案件，多年从事美国贸易政策研究。管健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要理念即是“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2018年特朗普贸易政策主要包含：通过维护经济安全来保障国家安全；达成更多美国人受益的贸易协定；加大执法力度，让不遵守规则者不再获利（占美国便宜）；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有效市场间推广规则。

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已采取的贸易措施来看，在“美国优先”口号下所发动的贸易战可谓不区分国家，“一视同仁”。至于今年的《2019年美国贸易政策日程》，管健认为该报告重点强调在特朗普政府的治理下，对美国的主要贸易义务进行修改，并强化贸易执法。特朗普将继续寻求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并实施更强的贸易执法。

据了解，美国的301调查主要针对中国，232调查和337调查则主要针对欧盟、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很多国家除了采取报复性措施，也提起针对美国贸易措施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美贸易战虽暂时停止，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的四处开火仍在继续，这无疑给全球贸易带来更多动荡和不确定。

王鹏指出，美国发动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来承担的。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该国5月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长8.4%。

拉加德掌舵欧洲央行能否驶过“暗礁”？

■ **徐映**

欧盟特别峰会敲定了欧洲议会选举后欧盟新任关键职务人选，最受关注的是两位最具分量的女将：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被提名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即将出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称，为接受欧央行的职务，她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暂停现有职务。

现年63岁的拉加德，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在2018年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名单中，拉加德排名第三，仅次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欧元区的货币管理中枢将迎来首位女性行长。自2011年以来，拉加德一直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位女主席，也是八国集团首位女性经济/财政部长。

提名拉加德的决定，是欧盟考虑了任职能力和政治力量平衡等综合因素的结果。拉加德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体现了法国力争为本国取得不明显低于欧委会主席这样强力职位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拉加德履历兼具国际视野以及自由进步属性，不但符合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期望，而且她的出任也可防止欧洲央行由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或芬兰、荷兰等北欧籍财政官员接手的可能，缓解南欧国家对欧洲央行未来可能采取鹰派紧缩货币政策的忧虑。

拉加德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今后几个月欧洲货币政策走向将是怎样的？需要考虑三个因素：船、大海和船长。船指的是欧洲央行的现状，具体是指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大海指的是世界宏观经济的发展，船长指的是新行长的能力。要行驶好这艘船，新船长必须至少具备两大才能：审慎的态度、灵活的操作。女性更具备这两项才能，拉加德当这艘船的掌舵人似乎更有优势。然而，摆在拉加德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松。

当前，欧元区目前虽不比德拉吉接手时的危机情形，但内外状况依然严峻。欧元区经济自2017年达到复苏的高峰后，表现即开始下行，2018年下半年，德国和意大利均出现一定程度衰退，带动整体增长率仅达到1.1%。今年一季度，欧元区虽有一定企稳复苏迹象，但内外形势依旧严峻。欧洲央行最关注的通胀率徘徊于1.2%，远低于不超过2%的政策目标，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英国“脱欧”前景不明朗、意大利与欧盟在预算问题的博弈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均是欧元区面对的重大风险点。

分析人士认为，拉加德在协调欧洲各国货币金融政策立场、寻求最大公约数方面有其独特优势，未来有爱尔兰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莲恩为首的技术团队的助力、支持，拉加德也会更有能力迅速转换角色，推动欧洲央行促进欧元区经济稳定增长，实现政策目标。

分析人士指出，衡量货币政策的优劣需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要判定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要尽可能地避开各种干扰，这种干扰可能是短期的，是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采取的权宜之计。在这方面，拉加德是在一艘坚实的船上，因为欧洲央行的目标是唯一的，那就是要捍卫欧元的稳定性，这个目标同样也是稳定的，因为目标的修改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点来说，她比她的美国同事更加幸运，因为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美联储的地位更有从属性。第二，在操作层面上，拉加德似乎有“一盒子”的操作工具，比八年前德拉吉上任时可使用的更广泛、更具体。德拉吉从前任特里谢那里接受的只有利率工具，而为了应对流动性陷阱引起的极端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紧缩和经济衰退，德拉吉不得不采用了新的操作工具来面对新的形势。当时必须采取非常规的规划和货币政策，所以就出现了零利率和负利率，在过度的金融市场上购买各种期限和品种的债券，对未来的货币政策进行约束和规范。

到今天，这“一盒子”操作工具并非“只有玫瑰没有刺”。在规划方向时，拉加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今货币政策中使用的所谓非常规手段的约束。过度的操作手段肯定是一把双刃剑，过分使用反而会伤及自身。在使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表现一定比例的逆向性，用得越久，次要因素带来的风险越会增加——无论是在税收层面还是银行本身。

尽管航速不快，但这艘船目前是可靠的。之所以行驶不快，原因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大海。拉加德将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形势？在这方面至少有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变量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经济增长以及通胀影响之间的关系，今天的通货膨胀在欧洲表现得比以往都疲弱；第三个变量是持续了十多年的全面的私人和公共债务问题，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增长。换句话说，对拉加德而言，制定新的货币政策并不容易，因为还有三件事是目前无法确定的，第一是来自不确定性的影响，“明天是否会出现今天所未知的新状况”成为大概率趋势；第二是货币和利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力和增长力；第三是总债务的规模和组成所带来的影响，这对欧洲央行来说，同样是必须面对的。

总而言之，大海必定波涛汹涌，拉加德必须具备掌舵一家中央银行的能力，才能和她的同事们一起保证欧洲央行政策行为的可信性、可行性和灵活性。这一点，是一家中央银行眼下能为货币政策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一个不确定的客观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有正确的判断力，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明确的、透明的，也意味着操作手段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应对预期的和非预期的宏观经济新变化。因此，极端对立的手段不可取，套用一下来说，鹰派不可取，因为他们虽然谨慎但过于严厉，鸽派也不行，因为他们虽然灵活但不够谨慎。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审慎。

从欧洲主要媒体最新的反馈来看，一位女性央行行长似乎对欧洲有利，大家也急切地期待着欧洲央行新的掌门人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位船长，掌舵欧洲央行这艘坚实的航船，安全、平稳、顺利地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欧元区经济复苏陷入迷茫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的工业生产同环比均有所下降，而德国4月份工业产出也不及预期。在欧元区经济不景气背景下，欧洲央行近期表示，将加息时间至少推迟至2020年上半年以后。业内专家认为，欧元区经济很可能在今后几年都难以走出“泥沼”。

尽管欧元区经济复苏前路漫漫，但很多东欧国家还想加入。最近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央行）行长伊萨雷斯库在获得连任后表示，新一届董事会将积极推动罗马尼亚加入欧元区。伊萨雷斯库声称，推动罗马尼亚加入欧元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充满挑战。据了解，罗马尼亚去年成立了实施加入欧元区国家计划全国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制定加入欧元区时间表等准备工作。罗马尼亚总理登奇勒在该机构2018年4月举行的首次会议上表示，加入欧元区对罗马尼亚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整体经济发展疲软

欧元区经历过2008年欧债危机的沉重打击。从2014年开始，欧元区虽然从危机中复苏，但整体仍陷入低迷。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晓涛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元区经济提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需，虽然受到外需走强的带动，欧元区经济于2017年曾出现短期好转，但自2018年以来增速持续放缓，多家机构纷纷下调了对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

据相关数据显示，尽管2019年第一季度受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复苏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高于预期（GDP同比上涨1.2%，高于预期的1.1%），但是GDP增速同比呈下降趋势。“由于欧元经济区整体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欧贸易摩擦将给欧元经济区经济带来冲击，而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GDP增长和PMI值上均表现不佳。”张晓涛说。

在全球经济形势向下的情况下，欧元区经济前景低迷。债务危机带来的危害尚未完全消除，“PMI指数持续低迷，表明制造业呈收缩状态，难以驱动经济发展，因此，欧元区整体经济基本面脆弱，对外依存度高，短期内难以走出低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认为，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靠原来那些“问题国家”经济的回升。纵观欧元区主要国家，增长引擎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其次体量较大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近些年来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困扰，譬如汽车出口量的大幅减少导致德国经济增速下滑，法国的投资和消费去年大幅度下滑，意大利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速大幅下降，等等，这些因素都使欧元区的经济一直无法得以复苏。

多方因素制约复苏

“欧洲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面临恐怖主义、边境问题、移民问题等多重忧患，欧元区经济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英国‘脱欧’、法国国内局势动荡、美欧贸易争端等。”在张晓涛看来，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受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影响转向中性、结构性改革效应、欧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总的看来，欧元区多数成员国债务负担过重，预示着成员国难以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受经济增速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欧元区成员国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还要增加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使政府债务比例持续上升，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政府债务比例已经超过120%。

贺力平认为，债务比例过高，意味着这些国家为减少政府债务总额，必须采取增收节支措施，这种做法不仅使部分成员国无法通过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还会制约重债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英国“脱欧”对本来就不景气的欧元区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加大了欧盟和英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直接对贸易和消费信心产生消极影响。张晓涛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从根本上取决于全球经济成长动能，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容易受到全球贸易变化和贸易争端的影响。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全球制造业下滑，打击了商业活动和信心，加大了欧元区经经济复苏的外部阻力。

张晓涛称，虽然作为欧元区的一员，会使成员国在制定本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受到一些限制，但有利于成员国在欧洲市场的贸易状况，增加本国企业利润以维护自身市场的稳定。